

■ 阎佩衡 著

英汉与汉英 翻译教学论

*A Two-sided Conversational Framework for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高等 教育 出 版 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英汉与汉英

A Two-sided Conversational Framework for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翻译教学论

阎佩衡 著



高等 教育 出 版 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内容提要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是一个由语内翻译、语文翻译、语际翻译和实际翻译四个部分——“翻”、“比”、“译”、“练”四个紧紧相扣的链环构成的翻译及其教学方案，其执行要领在于始终将每一个环节都置于一个二度对话式语境体系（三维语境）的规约之中，从而使英汉互译从言内意义、言外意义和言后意义上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善”、“美”的效果。本教学论适宜作大学本科教材，兼供研究生和自修生学习之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 / 阎佩衡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ISBN 7-04-017717-X

I. 英... II. 阎... III. 英语—翻译—教学研究—
高等学校—教材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3058 号

策划编辑 陈锡镖 责任编辑 杜颖方 封面设计 王 峥 责任绘图 王 辉
版式设计 金黎瑛 责任校对 田素芳 责任印制 宋克学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北京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http://www.landraco.com.cn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8.5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0 000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7717-00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 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传 真：(010) 82086060

E - mail: dd@he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 编：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序

阎佩衡同志，是我 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时的学生。他，幼承家学，敏而好问，多经失利，痴心不改，是一个一心教书的人。

多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有诚，不忘成功与失败的甘苦；治学有方，常念理论与实践的纠葛。无论是治学还是教书，他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方法。从教育到艺术，从语言到文化，从阅读到口语，从语言理论到翻译研究，他总是顺藤摸瓜，总有旁通的灵性和感悟；他博猎旁通，主意常新，颇得海内外专家和教授的垂青。撰有三十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书刊上。

近几年，他又在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二度对话翻译教学模式”的构建，并依据这一理论的构架完成了《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的编撰工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看过这部教程，自觉有以下特点：

一是理论组织科学，时见新颖之处。

首先，他将翻译过程规划在一个由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然后由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折线流程之内。这一设想相当大胆，但是以乔姆斯基(N. Chomsky)(美)的理论为依据。

然后，他又根据奈达(Eugene A. Nida)(美)的理论，给翻译中的理解过程设计了一个语内转换的过渡性环节。他把这种语内转换的方式组建为一套“逻辑语法”，而与普通语法区别开来。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操作的步骤，也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是科学的、实用的。

更重要的是，他给翻译及其教学的全过程设计了三个路子：一是文本的和非文本的路子；二是文化的和非文化的路子；三是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路子。其目的无非是将整个翻译行为置于一个既跨学科又跨文化的空间之中，形成一个翻译运作的约束机制，从而使翻译教学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纳入三个思路的统筹之中得以解决，最终求得翻译“对等”(equivalence)概率的相对提高。

佩衡把这个机制叫做“语境体系”，这是对语境概念的扩大和延伸，是独到的，也是符合情理的。它既涉及了语内(学科内)因素又涉及了语外(学科外)的因素，因而足以构成翻译的(大)文化语境，自然也是佩衡的学术视野所及。同时，它实际上既是一个对翻译主体知识

结构的设计,也是在多年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产生的,因而已经对学生综合修养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是实践板块安排合理,既有基本功的训练(词、句处理,考虑周到),又有各种不同文体的翻译(从描写性文字、叙述性文字、阐述性文字、论述性文字、应用性文字、科技性文字到对话中的文字等,应有尽有),便于组织课内外练习。

三是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培养,并将(宋代)陈善的“入出法”巧妙地贯穿于“理解”与“表达”的二度“对话”过程之中;在实践板块的设计中也处处考虑了“学习”方式的培养问题。只要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所谓“二度对话”,在“教”是一个新颖的组织方式;在“学”则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另外,将两种语言文化的比较安排在“二度对话”之间,作为过渡之用,是符合逻辑的;将国内外有关翻译和外语学习的网址列入书中,从而保持了本教学论的开放性。

总之,我以为本教学论既有理论组织,又有真知灼见,其整个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练习的方式都与众不同,是称得起“一家之言”的。是为序。

黄席群

2004年4月6日

于西北师范大学

译学译技与参禅悟道

——序阎佩衡《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

译技领悟如修道，修者有下根、中根、上根器之分。

下根器者，或泥于字词句法之间，规行矩步，未敢稍越原作藩篱，其遣词造句，诘屈聱牙，不可卒读，而自诩忠实；或超然于字词句法之外，自行挥洒，任意改纂，其造句虽清丽可读，然背叛忤逆原作本意，实与谋杀等罪。

中根器者，唯原作本意马首是瞻，唯绳墨以为度，字词句法亦步亦趋，达意而不违形，顾形而不忘意，用语中和，循序而有所归，增减、转换、正反、拆合之对策，烂熟于心，虽非光彩粲然，毕竟平易畅达，亦可称译人之时者。

上根器者，执形而不为形所拘役，达意而不故为意所增辉；著粉施朱，是摹原神而轻表面；组合重装，是破外序而踪内序；或形有亏，而援神补；或神有失而图形胜；似与不似之间，锱铢必较；达与不达之内，宜词必争。

译学参悟亦如参禅，参者有不悟、渐悟、顿悟之别。

不悟者，虽染指译论多年，徒以条陈绵密而不知变通；满腹中西译论横陈竖列，未得纶贯；苟得志，以学舌为营生者是也。

渐悟者，先学技、用技、而后论技；或先学论、用论、而后创论，浸淫其中至少十年、二十年、乃至数十年，每有小得、小悟，日积月累，合而得其中三昧。译界众生，以此经历最为普遍。

顿悟者，天资聪颖，触类旁通者是也。不假百万言译著，不借古今前贤宏论，中得心源，外藉引申，断一指而见性明心，触片瓦而悟菩提大道，缘聚现量，豁然贯通。

阎君佩衡，大西北俊杰之士，以一卷《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崛起翻译教学论坛，嘱余为序，未敢辞。数十年来，中华译界教学甚昌，然教学论专著则甚寡。阎君此著，可谓别树一帜。取精用宏，立论颇高。层面多，角度更多；重实践、更重思辨；二度对话、综合俯瞰；语内与语际交叉，文本与文化转换；纵横经纬，左右贯通，实译界教学专著类佳篇。上下根器者读之宜有所得，渐悟、顿悟者，读之可印证会通。

是为序。

辜正坤

2005年6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自序（一）

学过师范，也做了老师，自然晓得：只管在“增减拆合”式的修辞性技巧上打主意，决不是高明的翻译教学；一味地强调翻译的“实践性”，还可能陷入经验主义，乃至遭遇“惩罚性的后果”（punitive result），因为经验主义毕竟不是科学，也不像艺术。

困惑之余，便不得不摸索摸索——有理论的也有实践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唯不晓得能不能实实在在地摸出个属于自己的路子来——于是，只好学学、问问。

翻译学概念的提出，给人们的启示是：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语际转换中，是没有“直线”（式）捷径可走的：仅在语言一个层面上周旋，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仅靠前人的经验办事，是赶不上需要的。解决语言形式的转换问题，需要深入“形式”的内涵，涉猎“内容”的外延，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综合而细致地考察。

现在广泛采纳的传统的英汉翻译教程或汉英翻译教程都以“技巧”式的经验传授和技术训练贯穿始终；将英汉和汉英翻译分而处理，无意中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这是不符合翻译及其教学规律的。

一味地进行技巧操练，常常会忘记语言“骨子里的东西”（the nakedness）——思想、情感和文化，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无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

所以，内省的、思辨式的本体研究必须向科学的、外拓型客体探索转变。换言之，翻译问题需要放在一个既跨学科又跨文化的立体语境中去考察，这是当代翻译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笔者自己斟酌和解决问题了。

“二度对话”式翻译教学模式，是笔者在多年“教”与“学”的实践与理论摸索中所形成的一种教（与）学方案；它虽产生于本、专科的翻译教学之后，但仍可供研究生学习与参考之用；自然，如参阅其他刊本，则必然相得益彰。

在这个方案的具体构建中，笔者先后得到黄席群先生、郝苏民先生、张儒林先生、杨才铭先生和张致祥先生的激励与好评；模式及其所派生的教学方式，曾得到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英语教授 Anthony O’Keeffe 先生、罗马尼亚锡比乌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英美研究系教授 Eric Gilder 先生以及克罗地亚里耶卡大学哲学系英籍专家 William J. Candler 先生的垂青与推崇；在方案建设的后期，还得到山东大学翻译学院孙迎春教授的积极合作与热情推广；后又幸遇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命笔作序。

多年来,在成书前、成书中乃至在成书的最后阶段,参加本教学论受课的广大同学都为此书提供了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部分同学还参加了最后阶段的文字校对工作;课题构建中,承蒙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鼎力举荐,本书的出版被列为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本《教学论》在问世后,得到了诸多同仁及读者们的赞誉,也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关注乃至质疑。相信,二者都会给本教学论带来质的改变,在此一并致谢。

2003年6月6日于半学屋

自序(二)

语用学、应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乃至比较文化语言学等前沿理论让我们意识到：语言内部的问题，常常需要跨出语言形式的束缚，到语言之外去寻找答案。

于是，翻译及其教学就不能总是停留在对“主体”的“内省”中谋求问题的解决，而应该从“客体”“外拓”，借助于语言学、文化学以及比较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的滋养，通过对翻译流程及其赖以运作的周边环境的合理优化以及对诸多变量的综合考察来谋求问题的解决。

1. 假设

如果把翻译设定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语言)“关系学”，那么翻译及其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两种语言之间的内外关系，使之在改变了各自的形式之后，依然保持其内在蕴涵的“故我”，不失原有的“丰姿”；如果从甲语言到乙语言的直线式运作流程是造成翻译结果误差的理论根源，那么就应该有一条折线型转换流程与之相区别而存在；如果一次性转换是不足以完成“达意”的实践原因，那么就需要增设一个过渡性预备转换过程，为翻译的最终“达意”先做好铺垫；如果仅靠单一的文本“上下文”(context)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那么就需要构建一个超出文本范围的“周边环境”，从而给翻译流程提供一个良性运作的“大语境”——“话语”氛围。

2. 推理

既然可以把翻译运作设定在一条折线型流程之间，这个流程就一定是一个两度操作的构架：一是语内(逻辑)转换(*intra-lingual transformation*)；二是语际(形式)转换(*inter-lingual transformation*)。在这里，语内(逻辑)转换，就应该是笔者为翻译流程所设定的预备性过渡转换。

既然语境需要超出文本去设定，那它就一定是一个既包含语内因素又包含语外因素的大语境——一个包括文化乃至作者生平、阅历、人生观及其文风在内的广义的“话语氛围”，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文本)语境。

于是，问题就需要沿着三条思路去考察：一是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路线；二是文本的和非文本的路线；三是文化的和非文化的路线。

由以上三条路线所分割的两个侧面，则自然地构成了笔者所试图寻找的两个语义渠道：

一是语内渠道,即:语言的、文本的和文化的渠道;二是语外渠道,即:非语言的、非文本的和非文化的渠道。

依据语用学、应用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所提供的语义学原理,以上两个渠道所包含的语义走势可以按如下的分支被界定为:

一是语内意义及其子类:概念意义和命题意义;二是语外意义及其子类:表征意义、表达意义、社交意义、祈使意义和联想意义。

如果以上的推理是符合逻辑的,笔者的假设就是可行的。那么,结论就必然是:

- 1) 一条由语内和语际两度转换所构成的折线型翻译流程;
- 2) 三条思路所明确的语义走势:一是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二是文本的和非文本的;三是文化的和非文化的。
- 3) 由三个语义走势所区分的两个语义渠道:语内(概念意义和命题意义)分析和语外(表征意义、表达意义、社交意义、祈使意义以及联想意义)分析。

4) 由三个语义走势及其两个渠道整合而成的语境体系:一是语言的与非语言的语境;二是文本的与非文本的语境;三是文化的与非文化的语境。这个由三个子语境所构成的体系便是笔者为翻译的操作方式——“二度对话”所设计的(大)“语境”,即“话语”氛围。

如果把本方案所建立的思路还原为一句话,那就是,将“翻译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①始终置于一个“二度对话”式“语境体系”(contextual system)的约束之中,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斟酌和处理理解中的问题,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斟酌和处理表达中的问题——以便将通过“言内意义”传达“言外意义”最终实现“言后意义”的事情办好。这就是“二度对话”所主张的既替作者负责又替读者负责的“双观”^②(式)翻译教学观。

如果以上的推理是符合逻辑的,以上的命题就是成立的。那么,笔者关于在一个语境体系(大语境)中的折线型翻译及其教学方案就是可行的。何不付诸实施?

2003年6月6日于半学屋

① Translatorial Action 是德国功能学派的贾斯塔·霍尔兹·曼塔利(Justa Holz-Mantttari)为转变译学观念而杜撰的一个专有名词,其含义比 Translation 要广泛得多,本文暂将它译为“翻译行为”。

② 英国翻译理论家波斯盖特(John P. Postgate)将翻译分为两类,一是着眼于读者的“前观式翻译”(prospective translation);二是着眼于作者的“后观式翻译”(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本教程则取其两者之优,合而用之,故有“双观”之概念。

目录



Contents

绪论	1
1 翻译史上的几点启示	1
2 翻译学上的几个问题	4
2.1 翻译是什么?	4
2.2 翻译不是什么?	5
2.3 本教学论的考虑	9
2.4 翻译流程的界定	11
2.5 翻译单位的确定	12
2.6 语境的重新考虑	12
2.7 翻译标准的拟定	13
2.8 翻译原则的把握	14
3 二度对话模式的构建	15
上卷 理解	19
1 什么是理解?	20
2 理解什么?	21
2.1 meaning 的概念	24
2.2 meaning 的意义	25
2.3 意义的分类	26
3 怎样理解?	26
3.1 理解原理——“对话”原理	27
3.2 结构主义与成分分析	31
3.3 转换生成与对话的路线	32

3.4 奈达理论与形式解读	33
3.5 文体与语域的把握	41
3.6 符号学与意义的分类	43
3.7 话语分析与翻译的单位	48
3.8 三维语境与二度对话“氛围”	49
3.9 “对话”渠道	58
3.10 逻辑分析	63
3.11 功能分析	65
3.12 文化分析	68
3.13 艺术分析	86
3.14 作者分析	92
3.15 读者分析	94
3.16 译者(主体)分析	94
3.17 其他分析	95
结语	96
中卷 比较	99
1 什么是比较?	100
2 比较什么?	100
3 怎么比较?	100
3.1 语言比较	100
3.2 文化比较	128
结语	136
下卷 表达	139
1 什么是表达?	140
2 表达什么?	141
3 怎么表达?	141
3.1 常规处理——直译	146
3.2 变通方式——意译	149
3.3 直译和意译兼用	152
3.4 直译加注释	152

3.5 释义性翻译	153
3.6 音译之补救	156
3.7 模仿	158
3.8 关于语感	159
3.9 关于惯用法	159
4 关于翻译方式策划	160
4.1 关于英汉翻译的一般方式策划	160
4.2 关于汉英翻译的一般方式策划	165
5 “二度对话”全过程操作示范	167
5.1 语内翻译——“入”于里	167
5.2 语文翻译——“介”于中	167
5.3 语际翻译——“出”于外	168
5.4 二度转换的语用意义	168
5.5 小词汇传达大情感	170
5.6 优劣有别	172
结语	191
附卷 练习	195
1 词语(意义)的翻译	197
2 句子的翻译	197
3 描述性文字的翻译	200
4 叙述性文字的翻译	203
5 阐述性文字的翻译	205
6 论述性文字的翻译	210
7 应用性文字的翻译	214
8 科技性文字的翻译	218
9 对话中的文字翻译	220
附卷练习参考答案	225
1 词语(意义)的翻译	225
2 句子的处理	226
3 描述性文字的翻译	242

4 叙述性文字的翻译	244
5 阐述性文字的翻译	247
6 论述性文字的翻译	252
7 应用性文字的翻译	256
8 科技性文字的翻译	261
9 对话中的文字翻译	262
 翻译及其教学流程示意图	269
常用工具书	270
常用网址	272
主要参考文献	273
后记	276

绪 论

任何一本书的存在价值都在于，其说法及其做法都能够和另一本书的说法及其做法区别开来，因此就需要说上几句开头的话——作为引子。

1 翻译史上的几点启示

漫长的中西翻译史可以说是一部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长卷，远不是这里高谈阔论的话题。于是，我们只好就事论事，采取一点实用主义的态度。

如果将历时两千余年的西方翻译史，^①姑且以“二战”为界，那么前史就是一卷不乏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各说各长，莫衷一是，而后史则是一卷多见科学探索式的诸家之说，流派迭起，各持所长——如果说前史以哲学、美学、文学的视角经验地、思辨地阐述问题见长，那么后史则普遍是以科学的(尤其是以语言学乃至文化学的)方法论努力解决翻译问题的。

就前史而言，中西翻译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二者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在翻译是什么的问题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论；在翻译的方法论上都是讨论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在翻译的标准问题上都是探索替作者负责、替读者负责还是二者兼顾好的原则；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涉及最广的莫过于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如果把问题作一个实践意义上的归纳，翻译理论所要寻求的答案便都在于：什么样的理解才是准确的以及什么样的传达才是理想的这两个方面。如果重新回到理论意义的概括上去，翻译家们所从事的研究又无非是“翻译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进行翻译”两大问题。无独有偶，他们的做法都是“经验”的，他们的归纳都是“思辨”的。

如果说可以“二战”以前翻译理论的特点在于“求善”，并以此为翻译的实践提供一套“善行”的经验，那么“二战”以后翻译研究的特征就在于“求真”，并以此给译学的发展绘制出一幅“科学”和“文化”的蓝图。虽然“二战”以后的翻译理论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上的描写性阐述(或许这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翻译研究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了，其特点是：一方面汲取传统理论中有益的东西，一方面着力在许多

^① 据南木先生为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史》所撰“代序”一文，“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源远流长，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历时已达二千余年，几乎与我国翻译史同龄”，第1页。

新兴的学科领域,尤其是在语言学的发展中进行各种不同视角的探索,从而使翻译研究走上了一条“跨学科”的道路,从而在研究方法上,使战后的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这种翻译理论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弱点:一是翻译研究上的“规约性”(prescriptivism);二是多数翻译研究都过分重视个人的翻译经验和翻译细节(anecdotalism),从而忽视了翻译的系统规律——从局部上升到整体(from local to global)、从个性上升到共性,因而很难通过假设、验证和对比等手段上升为翻译理论。^①

直到进入了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以后),西方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因此有西方翻译理论家将20世纪称为“翻译的时代”。但是,只是在进入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翻译才突破了传统美学和语言学的框架,开始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视角上讨论问题,从而将翻译研究不断地引入了一个“跨文化”的“语境”,并使之成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

如果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则可以发现,在历时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翻译(行为)随着其“文化语境”的不断变化走过了三个漫长的阶段:一是口头翻译阶段;二是文字翻译阶段;三是文化翻译阶段。^②而随着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即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翻译研究便被引入了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立体语境之中;翻译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的文本范围之内,换言之,翻译的内涵,已经不再停留在所谓“文字转换”(即字面对等)的层面上,而是着眼于文化语境中的“信息”对等和“结果”等效,^③这是一个必须留心的东西。

如果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上所呈现的一派多元化趋势,看作是一种突破了传统美学和语言学的约束从而上升为某种文化反省的现象,那么,无论是这种趋势还是这种现象都不能说与西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兴起无关。^④

如果对美国翻译理论史的发展阶段加以理性地考察,结果应该是发人深省的,因为研究者们是以翻译行为与语言学的关系来区分美国翻译理论史发展阶段的。于是,第一个阶段,即美国传统翻译理论时期(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被归结为“前语言时期”,因为这一时期采用的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多的还是经验之谈;第二个阶段,即60年代到80年代初,被归结为“语言学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翻译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微观语言学(转换生成法)到宏观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过渡,这一过渡对翻译研究产生了

^① 这是蒙娜·贝克尔(Mona Baker)的观点,见Mona Baker,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plementary or Competing Paradig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Probleme und Methoden, ed. Wolferam Wilss (Gunter Narr Verlag Tübingen, 1996),第13页。

^② 参见《中国翻译》2004年第1期,谢天振文章“论译学观念现代化”。

^③ “信息”(message)对等的观念应该始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他认为,“人们通常不是用一种语言的符号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单个的符号,而是代替‘更大的单位’”,即所谓“message”,所以“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符号中的对等信息”(参见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第87页);结果对等则应该始于奈达(Eugene A. Nida),即“译者应力求使译文读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信息的反应趋于一致,即把重点放在原文的内容上”(参见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第73页),亦即要把翻译的眼光放在译文的结果上。

^④ 参见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第155页。